

不忘初心，凝聚责任（三）

长征路线集中在中国的西南、西北地区，经过了苗、瑶、壮、布依、彝、藏、羌、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。

由于历史形成的民族隔阂以及语言、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，红军长征到达这些地方后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形势，能不能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，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对敌，是红军能否完成战略大转移的一个严峻考验。

许多少数民族在反抗民族压迫的过程中，其领导者和组织者成为整个民族利益的代表，有的甚至成为英雄，在群众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，主导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，对他们的不敬，往往被视为对整个民族的侵犯。

有鉴于此，中共中央和红军一改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的做法，宣布保护少数民族及其宗教上层利益，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习俗，并积极开展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及其宗教上层的工作。

贵州镇宁县布依族的首领陆瑞光，排黔中“四大天王”之首，在当地很有威望。1935年4月，红一方面军进入镇宁地界后，需要通过陆瑞光控制的地盘。军团长彭德怀、政委杨尚昆及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决定亲自前去拜访陆瑞光。

陆瑞光先是派出一名连长冒充自己见客。但是，由于彭德怀之前听人描述过陆瑞光“满脸麻子”，所以当场笑着揭穿。陆瑞光又派出已升任参谋长的张海宽再冒充。张海宽招待他们喝过茶后，彭德怀又笑着说：“我们茶也喝了，怎么真菩萨还不现身啊？”张海宽见瞒不过，只好回到后山上，向陆瑞光描述几位红军首长“一团和气”。于是，陆瑞光决定亲自装扮成普通士兵前来探查。下山后，他首先看见的是一排排红军抱枪端坐在院子里，他又到各个房间看了看，发现房门都是关着的，红军只是在厢房里打地铺休息，家中各处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这时，陆瑞光的顾虑才消除，他主动来到三位首长的身边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陆瑞光。”

交谈中，彭德怀三人耐心向陆宣传党的民族平等、民族团结政策和革命道理，陆瑞光如梦初醒，认识到这些年来自己起义的目的和红军的革命理想其实是一致的。当晚，就与红军签下了一份《反对蒋介石、王家烈、犹国才苛捐杂税的协议》，双方还商定，红军留下12名伤员，由陆瑞光负责保护并提供伙食医疗，这些伤员恢复后，协助陆瑞光工作。随后，彭德怀还赠送陆瑞光36支步枪，一面红旗。4月17日一早，红军离开时，陆瑞光送了10多里地才返回。彭德怀、杨尚昆率领的红军主力经过良田、坝草到北盘江渡口，顺利进入了贞丰境内。5月3日，红军巧渡金沙江，粉碎了蒋介石“前堵后追”，妄图围歼红军于滇黔的阴谋。

1935年5月，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彝族地区，虽然暂时摆脱了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，达到了北渡长江，进入四川境内的战略目的，但是还未能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，眼前首要困难就是必须迅速飞越天险大渡河。

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：一条是当时的大路，由西昌至雅安；另一条是崎岖难走的羊肠小路，要通过彝族聚居区。由于四川军阀对彝族的压迫，彝族对于汉人的仇恨甚深，在当时，人们把经彝族区的小路视为畏途，军队——尤其是汉人军队要通过这一地区是很不容易的。

当蒋介石得知红军渡过金沙江，向大渡河急进的消息后，认为消灭红军的机会来了，他决心要使红军重演72年前太平天国将士全军覆灭的悲剧，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。5月10日，蒋介石从贵阳飞抵昆明，调集中央军和川军10余万人，制订了一个企图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以南的作战计划。

蒋介石断定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，因此在大路上围堵下了大本钱。他还命令守大渡河的部队：收缴南岸渡河的船只以及渡河材料，全部集中于北岸；搜集南岸民间粮食，运送北岸，实行坚壁清野；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，悉数加以焚烧。

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又一个紧要关头，毛泽东决心打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。他断定蒋介石以为红军不敢走小路，因此小路的防备一定较弱。他决定组织一支先遣队，排除一切困难通

过彝民居住区，抢渡大渡河天险。5月19日，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，聂荣臻为政治委员，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队长。

先遣队临行前，毛泽东嘱咐：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，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，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，用和平的办法借道彝民区。只要全体红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，就一定能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。

先遣队于5月22日进入彝族区，遭到了不明真相的彝族群众围攻，武器被夺走，官兵被打伤，甚至连身上的军装也被抢走了。但红军官兵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积极向彝族群众宣传革命道理，告诉他们红军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军队。通过沟通和谈判，刘伯承按照彝族风俗歃血盟誓，与沽鸡家支头人果基小叶丹喝了鸡血酒，结为金兰之义。随后，在小叶丹安排下，7天内将中央红军大部队护送出彝族区，红军得以迅速安全地通过大凉山。

后来，毛泽东在大渡河边见到刘伯承问道：“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，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？”刘伯承说：“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。”毛泽东又问：“你跟小叶丹结拜，是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？”刘伯承回答说：“那当然，彝人最讲义气。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。”毛泽东还问：“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还是右腿呢？”刘伯承正欲回答，周恩来笑着说：“后续部队通过彝区时，小叶丹打着‘中国红军彝民沽鸡支队’的旗帜出来迎接。你们把彝区赤化了！”

可以说，“彝海结盟”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的第一次体现和重大胜利，给奇迹般的万里长征增添了最光彩的一笔。

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的感召下，红军所经过地区的少数民族不仅让开了道路，供给了物资，有的还参加了红军，他们对红军由原来的敌视、疑虑、恐惧、疏远变为亲近、拥护和全力支持。据记载，红军途经黔西北时，苗、彝、回、汉各族子弟参军者达 6000 余人；在甘肃，仅红二方面军就接收新战士 3000 余人，红四方军扩编了一个独立师；在宁夏西吉县就有近 300 名回族青年报名参军。鉴于少数民族战士增多，红一方面军成立了两个回民训练队和一个回民师。各族人民子弟兵的踊跃参军，给红军增加了新鲜的血液，使严重的减员得到补充，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。这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下的红军来说，无疑是巨大的支持和鼓舞。